

安阳地方史志丛书

张之考证

安阳考釋

殷邶安阳考证集



845
53
37

序

我第一次得知张之先生的名字，是在季龙（谭其骧）先师收到他寄赠的《红楼梦新补》后。先师曾对我说：“这位张先生续得不错。”我在随先师外出途中翻过几段，觉得果然与原著神似。当时只知道张先生是河南安阳人，并且有一个很好记的地址：“××巷×号。因此在我的想象中，张先生必定是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但以后先师又收到了他寄来的研究古邺都的论文，我才发现张先生不仅是位才子，还是一位博学多闻、治学谨严的学者。直到1986年秋，我随先师去安阳参加古都论证会，才见到景仰已久的张先生，原来他是一位睿智而朴实的学者，又是一位十分谦和令人尊敬的长者。

此后，张先生不断有新作寄给先师，都是研究古都安阳的专题论文，有的发表于《历史地理》，有的由先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我也曾遵嘱代先师覆过几封信。1991年10月先师最后一次病后，已不能说话和写字，但曾经有一段时间可以短时间阅读，从他的反应看似乎也能听懂我们对他说过的话。我曾经告诉他，张先生又来信了，但他已经无法表达对张先生论文的意见了。更令人遗憾的是，当张先生的论文结集出版之际，先师离开我们已有一年多了，没有能为这本集子写下他本来乐意写的话。

我这样说并非泥于礼节，或是出于对张先生尊敬的私心，也不是现在想当然，而是根据先师生前对张先生所作的研究的关注和重视。

早在六十年代，在给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学生讲课时，先师就提出了“七大政治中心”，用以区别于当时流行的“六

大古都”的提法。以后他逐渐形成“七大古都”的想法，在七十年代末的学术报告中已多次提及，并撰写成《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上、中）二篇，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1981年第1、2两期上。原计划的下篇，除了将中篇中“七大古都何以先后被选为首都”续完（中篇只写了长安、洛阳、邺），还准备作一总结。但由于工作繁忙，虽已命我据讲课内容整理成一草稿，却一直没有能改定写出。1986年秋，安阳市请先师去参加古都论证会，他在会期又具体论述了对安阳列为七大古都之一的看法。1988年8月，中国古都学会在安阳召开年会，一致赞成“七大古都”说，并决定编写《中国七大古都》，请谭先生作序，他才利用作序的机会，作了一个简短的补充（见《中国七大古都》，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二辑）。

先师认为，古都是历史的产物。既然是讲历史，首先当然应该看这个都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它在建都时所起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有没有资格称大，首先也应该这样来分析。讲中国史一般从夏、商、周开始，但夏的历史目前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而且即使从文献记载看，夏的首都也是经常迁移的；就是商朝，在迁都殷以前也是经常迁都的；*所以殷是中国史上第一个长期延续的首都，时间又二百多年，是相当重要的。讲历史当然也不能不看名义，但更主要的是要讲实际。东汉末年名义上的首都是许，但实际的政治中心是在魏都邺。邺在当时的重要性不仅在许之上，也在其他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之上。

针对学术界一些不同意见，先师还指出：历代统治者择都的条件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实际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首都，就是用当时的标准看也是如此。有时强调了军事上的需要，经济条件就不理想；有时迁就漕运，就只能放弃山河之险。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古都，在当时也只是具有综合优势，并不是各方

面都是最优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古都，也应该综合起来看，不能一条条死扣标准。拿杭州和安阳比，用今天的地位是无法比的，但在历史上安阳的地位至少不在杭州之下。宋高宗选择杭州，而不选更有利于恢复的建康，主要是满足于偏安局面。杭州的优势主要也是经济、文化，包括名胜风景，一定要说军事上、政治上或者地理条件如何如何好，是说不通的。不过因为杭州一直是全国闻名的城市，把它列为古都之一就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安阳就没有这个条件。但我们研究历史地理的人不能这样看，应该综合分析。

在倡议将安阳列为中国七大古都的过程中，先师也深感当时对安阳古都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能够运用的成果实在太少。他说：“这也是安阳的一个弱点，从邺城失去都的位置以后，在全国的地位日渐下降，学者的研究也越来越少。要让大家接受安阳列为七大古都，就一定要加强对安阳的研究。像安阳与殷、邺的关系，就是搞历史的人也不一定清楚，自然就不会认识安阳就是殷、邺的后身。”

正因为如此，在收到张之先生研究古邺城的论文时，先师非常兴奋，立即仔细阅读，认真提出意见。在安阳市的论证会上，先师希望当地学者特别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充分利用当地的条件，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用历史事实来重现安阳古都的风采，让世人了解安阳。在与张先生的交谈中，先生又提到了古邺城、安阳、大名三地变迁消长的关系问题，希望张先生能写出专题论文。以后张先生果然撰成《说三邺三魏》一文，1991年初发表于《安阳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另一篇《邺之初筑是否在古邺城处》发表于《历史地理》第九辑上。张先生先后寄送先师的论文有六篇，先师读后大多提出过具体意见。他曾对我说：“现在吃古都饭的人不少，但象张之这样做踏实研究的人却还不多。安阳也好，其他古都也好，不能讲来讲去那么几句话，要有

新内容。各地的学者都象他这样，古都研究才会有进步。”记得还有一次，先师告诉我，张先生介绍安阳一种方志中转录的资料很有用。

现在，张先生的研究古都安阳的论文即将结集出版了，要是先师还健在的话，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必定会乐意为这本集子作序。大概是因为我曾随侍先师去安阳，并曾遵嘱代先师覆过张先生的信，了解这些情况，张先生一定要我为集子的出版写上几句话。我觉得有义务将先师的看法公诸于众，所以冒昧地应了张先生之命。

张先生的论文，一部分以前已经读过，另一部分是这次才拜读的。收入这部《安阳考释一般、邺、安阳考证集》的二十三篇论文，无论是近三万字的长文，还是三千余言的小考，都凝聚着先生数十年的心血和对故乡的无限深情，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述：“盘庚之宅，魏武之都，煌煌赫赫，众所艳称，况余生于斯、长于斯，沐其余辉，岂有不倾心而爱之者乎？以是，每常左史右志，相伴中宵，神驰于三千年中，与前贤晤对。复于春秋暇日，裹糗出城，探名胜，寻古迹，登山临水，访耆问宿。每值古与今会，便欣欣然自得其乐；其或荒烟蔓草，遗踪难觅，则不禁颓然嗒然，如失至宝。数十年来，多曾揽物疑生，检书歧出，兴之所至，锐意穷搜，必获其解而后已。”读了这段话，我们一定能够明白，为什么张先生会有如此坚韧不拔的毅力，能作出这样引人瞩目的成绩；我也更理解了，为什么先师会对张先生的研究寄以那么殷切的期望。

我虽曾追随先师十多年，并亲炙先师有关七大古都的教诲，却并未致力于古都研究，对安阳和殷、邺更无发言权可言，因而不敢对张先生的论文妄加评论。但拜读后感到，这些论文或发前人所未发，如《邺之初筑是否在古邺城处》；或集集前贤诸说而取舍增益，如《安阳城移徙增改考》；或以实地考察辩证史料，

如《黄泽与内黄》；或于旧史中发现新意，如《殷末别都朝歌地望考》。对张先生的具体结论，或许仁智互见；但对他细致踏实的学风和孜孜不倦的求实精神，我想是不会有异议的。去年见到一篇反对七大古都说并反对将安阳列为“大古都”的文章，除了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之外，作者似乎对安阳的历史和历史地理状况也不甚了了。如果这位先生能认真地读一下这本论文集，或许能更实事求是地讨论安阳能否列为大古都的问题。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定会进一步促进安阳古都的研究，有助于学术界对七大古都说的认同。

葛剑雄

1994年6月30日于复旦大学寓所。

自序

盘庚之宅，魏武之都，煌煌赫赫，众所艳称，况余生于斯、长于斯，沐其馀辉，岂有不倾心而爱之者乎？以是，每常左史右志，相伴中宵，神驰于三千年中，与前贤晤对。复于春秋暇日，裹糗出城，探名胜，寻古迹，登山临水，访耆问宿。每值古与今会，便欣欣然自得其乐；其或荒烟蔓草，遗踪难觅，则不禁颓然嗒然，如失至宝。数十年来，多曾揽物疑生，检书歧出，兴之所至，锐意穷搜，必获其解而后已。为时既久，所获渐多，乃握管铺笺而记其要。虽非职责所在，总以桑梓系情而难以遽止。

戊午岁上元佳节，故人李建玉见访，啜茗聊天，偶及安阳得名之义。建玉闻而喜，为介绍当年毛泽东主席莅安视察，垂询安阳得名事，促余联缀成篇，以飨关心安阳之人。后成《安阳考释》一文，公诸于世，不意屡为各方采用。于是素昔所获，依次写出，先后刊发九篇，其余若干篇，弃置篋中，其未写者虽尚不少，因致力他事，无暇顾及了。

如今年已望六，而事务有增无减，兴趣虽仍广泛，而精力、时间均不容兼顾，友好间也以集中精力相规劝。因将已发未发诸篇，再作审订，汇集成编，作一结束。古人云：“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不贤如余，谨以微力识其小者，作芹献之举，稍酬殷鄆水土育我之情。

安阳，今为省辖市，仍有安阳县，带五县，承两汉之魏郡、唐宋之相州鄆郡、元之彰德路、明清之彰德府。1949年前之河南第三行政区、1949年后之安阳地区而为河朔雄镇。此地西负太行，漳洹汤卫流经其间，交通便利，物阜民丰；“据河北之襟

喉，为天下之腰膂”，“其为险塞，自关以东，当为弁冕”。以是，有史以来便为人文荟萃之区，兵家必争之地。

尝为殷、邺二都所在，为中原王朝所都约四百载。殷、邺二都先后毁废后，隋仍称相州为邺都，每简刺史，特选贤能，诸如长孙平、梁彦光、樊叔略辈，皆以干练著称而当选。

唐初，设都督府于相州。全国都督府四十有一，除沿边国防所需者外，仅二十，而相州居其一。相州都督府乃大河以北，太行以东之唯一者。唐朝廷每以亲王为相州守，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相州都督，第九子越王贞，两次为相州刺史；高宗第八子李旦，让太子位于其兄，受封相王，开藩安阳，后，入承大统，是为睿宗。名臣张说、许圉师、宋璟、张嘉佑、房琯等先后守相州。《全唐文》卷三一六收李华《安阳县令厅壁记》，文云：“国朝之有天下，淇漳之间，于京师为近；守宰之寄，于元元最亲。故授署此官，延至王庭，曲蒙眷渥，制令褒赐与内官同法，清贯往往□拜。……天宝十载记。”所谓淇漳之间，正今安阳市辖区，其州县官能“与内官同法”，足见在唐朝廷心目中，安阳地位特高。便是安禄山父子也异常重视，在其起兵初期，已置重兵于安阳，号安阳军，安庆绪继位后，更以安阳为都，置安成府。

宋承五代，于相州置节度使，号彰德军；朝廷重臣寇准、韩琦，宗室赵不试，先后判知相州。金升相州为彰德府，特以亲王、驸马判知府事，卫绍王、宣宗皆其人也，而宣宗即自彰德入承帝位，驸马乌古论元忠则卒于知府任上。元为彰德路总管府，其达鲁花赤一职，例以朝廷勋旧重臣充之，直隶中书省。至正间，又先后开中书分省、枢密分院于彰德。

殷、邺二都先后毁废后，下迄元末，安阳非一般州郡之治所也。

明洪武起，改隶河南布政司，始为相当于州郡之府。然为紧要之地位不变。清顺治十三年上谕云：

知府乃吏民之本，其最重要者，如直隶之真、保、河间；江南之江宁、淮、扬、苏、松、常、镇；浙江之杭、嘉、湖、绍；山东之济南、青、兖；山西之太原、平阳；河南之开封、彰德；陕西之西安、延安；江西之南昌、吉安；湖广之武昌、荆、襄；福建之福州、泉州；共三十府。或政事殷繁，或地方扼要，著京外大臣，各举才行兼优者以备三十处知府之用。

彰德乃全国三十处要地之一，与贞观年间为全国二十处都督府之一相映照，安阳为紧要之地不变也。《方輿纪要·河南方輿纪要序》云：

以河南之全势较之，则宛不如洛，洛不如邺也明矣。且乎自古用兵，以邺而制洛也，常易；以洛而制邺也，常难。此亦形格势禁之理矣。

宛，南阳；洛，洛阳；邺，安阳也。视此，无怪顺治谕京外大臣，提到河南时，除省会“政事殷繁”之开封外，“扼要”之地唯独安阳。

历史上，安阳地位之重要，于兹可略窥一二。

自古大郡要害之处，常为兵家必争之地，每当群雄竞起，纷争割据之秋，事繁而多变革。四方要邑，莫不如此，而安阳特甚。秦始置安阳县，至清帝退位，两千余年间，仅县之建制一端，便废而复置者五，分而并者三，并而分者二。尤其曹魏、石赵，东魏三度省安阳入邺，以扩大都畿，及至晋隋一统，例有削邺以巩固新统治之举。于是，不仅恢复安阳县，且更分置新县。分置过多，县境过狭，待新王朝统治稳定后，便又别作省并。此其间，错综复杂，头绪极多。加以民族融合，战乱屡起，动辄城

毁民迁，文献损失严重。因之，无论当时、后世之官私记载皆受种种限制，不能详备，时有舛舛，甚至彼此出入甚大，抵牾丛生，徒令后人掩卷浩叹。清乾隆时学者，河南巡抚毕沅，在其《重修彰德府志序》中指出：

其地襟带漳洹，阻宅山阜，辙迹所会，此为要冲。千百年来，分争迭据，事迹既夥，条目滋繁，棼丝乱麻，易以舛舛。

其言诚是。历代史家或以别有用处而无暇顾此；府县诸志，或偶有所见，略作审辩，或罗列材料，不作论断，或避而不谈。要之，问题仍多存在，关心殷邺史事者，不宜袖手。余于此编致力处，乃就所接触到之某些问题，理端绪，辩正误，探阙佚也。

顾祖禹在其《方輿纪要》“凡例”中，云：“《元和志》无乃太疏，《寰宇记》引据不经，指陈多误。”又自评其书云：“读书无多，自省多误。”知地理之不易言也。前贤尚且如此，况余读书少，功力浅，有所考证，岂能允当！粗疏、错误之处，自必甚多，尚祈方家与读者不吝赐正。

张之

丙寅（1986）仲夏于邺下慰芹庐

目 录

序	葛剑雄(1)
自序	(6)
安阳考释	(1)
先安阳地名考略	(9)
安阳城移徙增改考	(21)
邺之初筑是否在古邺城处	(42)
说三邺三魏	(56)
历史上安阳与邺之关系	(69)
邺下古渠考	(86)
西门渠引用何水	(87)
引漳诸渠	(95)
五道万金渠	(110)
四道天平渠与隋太平渠	(122)
唐邺县两治所考	(130)
附:隋两治所	(133)
黄泽与内黄	(136)

尧城县治位今何处	(148)
林虑三考	(157)
灵泉考	(172)
“殷本纪”与“殷契”别解	(184)
河亶甲居相地望考	(187)
殷末别都朝歌地望考 ——史籍中之另一殷墟	(200)
殷都何时成为废墟	(205)
西门豹祠考	(210)
附：“光宅漳右”解	(219)
“三台”丛考	(223)
曹操墓何在	(231)
《邺中记》考订二则	(240)
附：隋《图经》考订一则	(247)
修定寺创建考	(250)
修定寺方塔始建年代考	(260)
“昼锦堂记”碑考	(272)
附：“昼锦堂”	(277)
后记	(280)
校后记	(282)

附图	(283)
一、安阳及其近处殷都遗迹示意图	(283)
二、安阳境内邶都遗迹示意图	(284)
三、历代安阳城位置示意图	(285)
四、相州城、昼锦堂、邶城驿示意图	(286)
五、邶下古渠示意图	(287)
六、西门豹祠、曹操墓、唐初邶县小城示意图	(288)
七、魏郡城(汉)位置示意图	(289)
八、黄泽、内黄县治、尧城县治示意图	(290)
九、紂朝歌方位示意图	(291)
十、林虑山、洹水上流示意图	(292)
十一、灵泉县治、相县治示意图	(293)
十二、后冈示意图	(294)

安阳考释

我国历史上以安阳为名之郡、县，有二十余处，其中唯有位于漳、洹二水流域之豫北安阳，今仍原名，为市、为县。兹对豫北安阳得名之义，试作考释。

《谷梁传·僖二十八年》有“水北为阳，山南为阳”之说。以阳为名之地，合此说者很多，与当地之山或水有关。如河阳、滏阳、衡阳、山阳等。反之，水南为阴，山北为阴，如淮阴、汤阴、华阴、蒙阴等。安阳一名是否与山或水有关，史书多未明载，唯有明崔铣《邺乘》^①与1932年《续安阳县志》曾作揣测。二者均依山南水北为阳之说，而解释不同。前者所释，为后者所驳。《续安阳县志·沿革》中，引有《邺乘》语，兹引续志有关处于下：

按安阳命名之义，据《邺乘》：“秦别将张唐攻魏，拔郑。王龁攻邯郸，不拔，引兵从唐拔宁新中，改名安阳。变宁为安，义相近矣。水北山南曰阳，其以在淇北故耶？”此外别无可考。唯安阳城南，密迩荡水，荡阴之名即取义于此。荡水之北自应名阳。《邺乘》释阳，不曰荡北而曰淇北，说固牵强，又变宁为安，亦近臆测。相传安阳境内之北岭名寿安山。城在寿安山之南故曰安阳。但寿安山之名不见于载籍。唯北岭之东麓有明赵府香火祠，颜曰寿安山堂，详本志

建置门。又迤西三十余里，正当北岭之巅，康王坟附近有圣人庙。父老流传，此庙在明之世，设有寿安书院，言之凿凿，亦堪依据。此虽皆明代遗址，而两处建筑咸名寿安，则北岭之为寿安山也，盖无庸疑。姑志之，以待考。

《续安阳县志》对《邶乘》之批评，有合有不合。今按：秦之安阳（宁新中）位今汤阴县东偏北，约十八里之故县村，在汤水（隋唐之前为荡水）南岸，不可说“荡北”也。续县志以为应是“荡北”者，乃以今安阳城立言。今安阳城非秦安阳，其批评不能成立。虽然如此。即以淇水为言，秦安阳位淇水北偏东，约六十里，《邶乘》之说，也属“牵强”。续县志对《邶乘》所作“变宁为安，亦近臆测”之批评，则是。清《彰德府志（卢）》辩误之二中，也云：“崔文敏（即崔铎）云：变宁为安，义相近矣，也未必然。”今按：自“寿安山”东南端起，至秦安阳，也在六十里开外，此六十里中，有洹、防、羸、汤诸水流经其间，更不宜指为“寿安山”之阳，何况“寿安山”名，从来未见于明朝前之官私记载，因此续县志之说，同样牵强。本篇抛开山南水北为阳之说，另辟途径，试作考释。

二

兹先分述历代设置众多安阳之情况，以探索安阳取名之义。

一、安阳一名最早见于战国，《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封其长子章为安阳君。其地在今河北蔚县附近。《水经注》“漯水”之“又东，迺安阳县故城北”，指此。

二、《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五十年拔魏之宁新中邑，更名安阳，即今豫北安阳之最初治所，在今汤阴县东，详

“安阳城移徙增改考”篇。

三、《史记》“项羽本纪”、“傅靳蒯成列传”，均载秦汉之际另一安阳。《索隐》、《正义》均引《地形志》，以为位今河南商丘北，即宋义救赵、项羽夺军处。详“邺下古蹟考·西门渠引用何水”篇之注①。

四、《元和志》载：秦之安阳，汉初废，以其地属荡阴县。另置安阳县、东安阳县、西安阳县。汉之安阳县，属汉中郡，在陕西省汉中附近，城固县东；东安阳县属代郡，即战国时赵之安阳；西安阳县属五原郡，在吴刺忒西，阴山南。

五、三国时，曹魏复置安阳县，旋，废入邺县，为豫北安阳之另一治所，位今安阳之北关，详见“安阳城移徙增改考”篇。孙吴也置安阳县，在浙江省瑞安县，即西晋之安固县。

六、西晋置安阳县、南安阳县，见《晋书·地理志》。晋安阳县即豫北安阳之又一治所，位今安阳城西南三里；南安阳县在河南省正阳县西南。

七、南北朝时无论南北，皆多有安阳县。《魏书·地形志》所载，东魏武定年间之安阳县有八，分别属于襄州舞阳郡、豫州义阳郡、东豫州汝南郡、郢州安阳郡、齐州东魏郡、徐州碭郡、扬州北谯郡、恒州高柳郡。另外，渭州还有南安阳县而无安阳县。又，北魏太武帝时曾将位于今甘肃省，当时之“中陶”，改为安阳。至于晋至北魏，位于今安阳西南三里之安阳县反废，并入司州魏尹之邺县。

按：《魏书》所载杂乱，如郢州安阳郡领县四：真阳、安阳、清阴（原注云：一本作青丘）、淮阴。豫州义阳郡领县五：义阳、清丘、平阳、真阳、安阳（原注云：后汉属汝南，晋罢，后复属，有真阳城）。安阳、义阳两郡便有三县相同，可以见出当时战乱频仍，时有更动而史书未能详考备载所形成之紊乱状态。清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考·凡例》说：“其重出之州郡

县，梁魏以前尚少，其后层见叠出。各国犹可也，此置彼效。甚且同在一国矣，更不解释，郡县竟有重出于一州内者。”可参。如此杂乱歧出，难以一一实指，然多位于其逐步扩展之新占地区，则甚明。

南朝刘宋，曾在豫南、皖北置三个安阳皆位其北部边境。

八、隋朝统一全国后，于开皇十年恢复豫北之安阳县，其余南北诸安阳县之废改，虽为时不一，但至此都不存在了。

观上所述，历代于各地所置安阳，多在边境或新占领地区。如战国时赵国之安阳，逼近燕国；秦国将新占领之宁新中改为安阳；汉朝在北方边境置东、西两安阳；后魏安阳最多，遍布新占领地区；刘宋在北方边境置三安阳。比较特殊者，是西汉和曹魏，都在其发祥地（汉中、邠）置安阳。

这就清楚了，众多安阳置于边境或新区，可知安阳取名之义，必与边境、新区有关。今按：安，可解为定，《玉篇》“定也”。安，又与危相对，贾谊《治安策》：“置之安处则安，置之危处则危。”所以用“安”字名边境城池，是希望不发生危险，用“安”字名新占地区，是希望稳定不反复。又按：阳，即是“日”，《诗经·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诗传》释“阳”：“日也”。日为君象，《左传·文四年》有“天子当阳”句。所以西汉、曹魏皆在其王朝发祥地置安阳。“阳”还可作“生”字解，《庄子·齐物论》：“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成立英疏“阳”：“生也”。通常称死者之事用“阴”，称生者之事用“阳”，如阳世、阳宅。春为四时之始，万物滋生，所以阳字又可代春字，如《国语·周语上》说：“史率阳官以命我司事”，句下注：“阳官，春官。”晋简文帝郑后名阿春，为了避讳，便改称“春秋”为“阳秋”。有时阳与春也并用，古有“阳春曲”；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有“阳春召我以烟景”句。生与春都是吉祥语，所以以阳字与安字相配，而名边远城邑、新占领地区和王朝发祥地。